

历史的回顾

法国领事任期内东京与中国事务

皮埃皮·塞杜 整理 ①

“死他！淹死茹·费里！打倒东京②佬！”……弗朗索瓦领事作为外交部惟一的派员，以外交总监保尔·贝尔的随员身份到达了印度支那。事后还不到一年，众议院的不满声和投票搞垮了政府（1885年4月6日）。3月30日，所有的巴黎人全上了大街，涌到协和广场，高呼让总理茹·费里下台，将之嘲为东京佬。原因是自去年8月以来，法国与中国一直处于交战状态……诚然，这场特别战争仅动员了海军与几支部队，规模不大，但是这仍旧是一场战争。

在上东京地区，中国正规部队在谅山路上设伏我们的军队

这是皮埃尔·塞杜先生根据书稿内容所涉及的一些历史背景或事件整理。——译注

东京，历史地名，法国殖民统治下的越南北部，又名北圻。——译注

为此，茹·费里早想报复。他要求对方从整个地区撤离，以及提出二亿五千万法郎的赔款要求。北京朝廷由于确想撤回军队，勉强接受了法国成为安南王朝的保护国，但是拒绝了赔款要求。他们支支吾吾，不作表态。1884年7月13日，巴黎发出了最后通牒。在再次遭到拒绝后，海军司令孤拔率舰炮击台湾，接着炮轰福州，随后封锁渤海湾。外交关系因此中断。

在法国，舆论并非完全赞同这些示威行动。一些民族主义者，他们指控茹·费里将赌注押在德国身上，用放弃夺回阿尔萨斯—洛林为代价，以换取对“殖民地”的再分配。的确多亏了俾斯麦，才可能实现天津的预备性谈判。既然开了仗，总有好处……另一些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法国人，他们站在左派的立场上，主要指责总理逃避在社会问题上的责任。平民区的巴黎人还能想起“茹·费里这个婊子”在1870年当市长的任期内，曾毫不犹豫地下令向市政厅前的人群开枪。他们像法国内地的农民一样，认为这东京佬的粗鲁行为之危险，可能被诠释为动员、派遣越来越多的部队去遥远、可怕的地区打仗。

残酷的土地，尽管孤拔将军狂轰滥炸，但是中国军队仍旧驻扎在原地。北京朝廷充满敌意，其它诸强也被法国军队的攻击行动所激怒——当然，德国除外。在此期间，在上东京地区，指挥官多米内及600官兵被数千中国军队包围在宣广的堡垒中。

茹·费里决定再加大打击力度。在1885年2月13日至3月25日之间的5个星期内，法国军队得到了加强。布里埃·德·利将军解了宣广之围，占领了谅山，并派出一支特遣队（由内格里耶将军带领）越过边境，到中国云南省境内搞演习^②。出乎法

内格里耶将军，有些史书中称尼格里（Négrier）。——译注
此为殖民者的观点，所谓“演可”，实属入侵。——译注

国军队的意外，冯元帅麾下的中国军队予以还击，法国人被驱赶出境。特遣队被赶回原地，德·内格里耶将军退守谅山，后来在法国殖民统治下的越南北部，又名北圻的命令下，很快地撤离谅山。可以说他立足未稳便飞快地逃跑了。这次撤离，很快通过一份令人惊慌的电报传到巴黎，从而终结了茹·费里的统治。但是他的事业很快得到了延续，那些打倒他的人承袭了他的政策，他们在中国获得了赔偿，得到了和平。这次多亏了英国，多亏了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天朝帝国才“无保留地”承认了法国为安南与东京的保护国。

巴黎继续组建印度支那，其构成国当时是交趾支那（殖民地）、安南国和柬埔寨王国（保护国）。安南和东京与突尼斯（保护国）不同，后者是由外交部领导，而前二国属于负责殖民事务的副部长管辖。这个机构很快由欧仁·艾蒂安主持，并且立即升格为一个完全独立的部级机关。

然而，东京的安抚事务远没有结束，而安南国东京省的行政机构隶属外交部。这也是为什么弗朗索瓦领事能成为常驻河内外交官的原因。

在 19 世纪最后 20 年代期间，东京的地位具有“多重”性。这就是说，不易准确断定任何一方的权限，因此经常导致愚蠢的争吵。弗朗索瓦不仅亲眼目睹了这些争吵，而且还有记录……为了贯彻一项决定，最少需要得到多方派员的支持，如战争部的、海军部的、外交和财政部的代表。如果哪个部门被遗忘，就会出现运转不灵……

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最终任命了一位总监，由他负

冯元帅，指清政府帮办广西军务的冯子材。——译注

责督促地方当局，管辖所有的常驻外交官。

第一任总监保尔·贝尔乘船抵达东京。他是位科学家，53岁，奥塞尔人，曾师从于克罗德·贝尔纳。他在心理学方面的成就令其声名远播，他尤擅解决动物移植术与呼吸方面的问题。1881年至1882年期间，他在甘必大内阁中任国民教育部部长。他到达印度支那时，决心对当地人实行自由的开放政策，包括对这些人以及他们习俗的管理。他更看重信念与影响的力量，而不是使用武力。在这点上，他得罪了西贡（交趾支那^①）所有的移殖民，因为这些人鼓吹用暴力镇压有独立倾向的种种人。保尔·贝尔完全赞同类似想法（是幻觉吗？），并在殖民地强行推行。茹·费里的政策正是出于这类想法而出台的。法国保护这么一个帝国符合下述三个目的：维持强大，促进文明，为经济发展提供出路。在1885年间，移殖民所指望的强硬作法引起了一系列的暴动与骚乱。年轻的国王惠^②，虽然沦为法军统帅库西将军的人质，仍装得挺气派。他后来被一个装潢门面似的人物所取代。尽管意见相佐，保尔·贝尔以他的办事效率，能成功地平息不同的思想。只有东京的事情还没有摆平。一些团伙始终聚集在嘯山区以及红河的上游河谷地带。在总参谋部，在军官食堂，在西贡“省”的土地上，在卡蒂纳街上，这些新贵们时常将“黑旗军”叫作“强盗”，但他们并不准确地知道黑旗代表着什么，意味着什么。要想探究出其间奥妙，还得需要好几年时间。保尔·贝尔还没来得及发展他的计划，便于1886年逝于河内。他的遗体经过西贡被庄重地运回法国。加莱海峡省前省长比韦尔取代了保尔

交趾支那，历史地名，法国殖民统治下的越南南部，又名南圻。——译注

惠，法语为Hué，根据史书考证，疑为阮福明。——译注

·贝尔。

在那些年的重大政治事件中，最少在涉及到我们的范围内，当数欧仁·艾蒂安入主殖民部。在将近 50 年的过程中（除了 1887 至 1888 年间的几个月期间），他一直被看作对外扩张的第一人。他创建了法国殖民学校，委托该校负责培养行政管理型人才，他建立了印度支那联邦，并纳入了交趾支那殖民地和三个保护国。印度支那联邦的所有大权集于总督一身。埃内斯特·康斯坦便是第一位正式到任的总督。由于欧仁·艾蒂安掌权，在人道和政治的口号下，明显地开始关注经济发展。这种口号茹·费里不久前还曾用过。当然，这二者之间显然存在着承袭现象。

80 年代末期，时代的标志仍是 1789 年百年革命环球大展。当时在巴黎，在练兵场，埃菲尔与他的工程师们建造了以他的姓冠名的“铁塔”。在荣军院的场地上，殖民展览首次激起了参观者的好奇。设计这一展览，目的就是在公众舆论方面改变法国人对其新帝国的看法。印度支那用四栋楼阁来代表，其中之一便是仿吴哥窟的建筑。安南与东京出现在一起。大家觉得当地人与欧罗巴人相比，在好些方面都属低等民族，但是他们却具备了发达而又独特的艺术感……

中国提出的原则问题

1894 年，清王朝已统治中国 250 年，如今已属于第 18 代王朝，也属于悠久历史中的第 25 个时期段。要知道埃及诞生于公元前 5 千年，而中国的历史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清人属于北方进来的民族，换句话说，他们是蒙古的女真人。他们让别人称自己为“满族”，以永远地纪念他们对东北殖民地的占领。这种作法有点像古罗马当年的决定，他们也将“非洲”称作西庇阿……1644 年，在上代王朝即明朝的末代皇帝自缢后，清人占领

了北京。他们当时得益于普遍腐败的政治气候，社会的混乱以及战火风烟的四起。

清朝前几任皇帝渐渐巩固了他们治理整个中国的权力，包括东南的一些省份。明朝的残存势力在那儿曾抵抗了好长时间。

“满族”正逐渐地被汉化。

世 0 T d (南) T j 1 0 . 8 7 T d (南) T j 1 0 . 8

客与做买卖生意一样，都是有选择性的。

中国人从英国人那儿学会了抽鸦片。在中国属禁品的罂粟汁，自从英国人走私进口后，便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孟加拉湾膏腴之地的平原种出来的产品，很快成为流通货币。为了重振局面，有位钦差大人派人在广州城里的各个烟馆收缴鸦片烟，并公开地将之烧得一干二净，像当今美国海军的一位将军在巴拿马的作法一样。英国人被激怒了。由于他们的后盾是联合王国，后者派出几艘三桅战船到长江入海口，炮击南部沿海。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了，中国签署了《南京条约》，该条约取消了“公行”商埠，并在广州到上海之间开放五个港口作贸易，外国人可以自由定居，将香港割让给英国。“退让”政策从此开始。路易·菲利浦统治下的法国，在第二年趁机强加了“允许传教士活动”的条款，此事自18世纪起一直是禁止的……

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由英、法两国共同发动的。这次战争的结果导致了《天津条约》的签定。北京只有在花光帝国的国库后，才批准了该条约（1860年）。西方人因此不仅赢得了在正式文件中不被指为“蛮夷”的承诺，而且还在北京开设公使馆，将触须又伸向了另外11个港口。

反帝国主义的口号在当时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正因为如此，四处都毫无顾忌地高呼着反对“不平等条约”，尤其是“炮舰政治”的口号。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这些口号一直有效地发挥着作用，直到毛泽东领导的革命砸碎旧世界，这个词才被放起来不用。然而在中国，相应的现实不易看清，还不如运用想像。国家太大，太混乱，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控制的。除了上海或广州的租界外，别处根本不存在那人人皆知的“瓜分中国”的现象。从帝国的灭亡到共和国，中国的官吏与商人渐渐懂得了限制“蛮夷”（始终是这种叫法）。他们编织着狭隘的网，网内尽

是欲念、腐败、讹诈以及暴力突然暴发的火焰。这些现象极大地限制了外国的影响。如果中国朝廷要提供方便的话，也只有获得各省的巡抚或者保守官僚的首肯时，才可能实施。在中国的外国人只可能形成一个额外的特权阶级。当一个帝国拥有 5 亿臣民时，2 万人算什么？大型工业或者贸易团体，当它们到中国来冒险时，用生命作抵押的风险与享受和那难以置信的收益成正比。正如预言家的预言那样，一切就这么发生着，好似中国还有很长的生命，正不断地变成散沙，它无视自身的弊病，尽管此病会将它扭曲得不像样子。随后，不时会出现正义的革命，它将抵消那些“高鼻子”的努力。

法国领事先在东京，随后在云南行使其职责的时间，两个阶段（1886 至 1888 年，1895 至 1903 年）加起来约合 20 来年。而在这些时间段内，中国人主要的生活特征是不稳定的。如果说混乱在某些方面有利于西方人的企图的话，它也是麻烦的主要之源，有时甚至是悲剧之源。事实上，权力在各省的巡抚手上。诚然，对于他们的失势，北京可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巡抚们会谨慎对待朝廷，以及维护朝中各派的利益。与此同时，他们面对有时要依靠的外国人，就像面对关系盘根错节的大臣们一样，时常表现出极大的独立性。正因为如此，著名的“义和团”起义并没有波及到北京以外的地区，而不是别人所说的那样，将义和团的造反排到 20 世纪初的所有起义之后。南方的那些总督们，尤其是两广总督，他们并没有奉遵北京的指示办事，也没有支持 1900 年反洋人的运动。

有些团伙抢夺地盘，鱼肉乡民和抢劫行人，极具杀伤力地伏击正规军队。这些人很难组成爱国的军队，因为他们干这类事情时有时出于不同的目的。当然，他们经常参加一些民众的起义，即有部分排外分子参加的那类起义（他们既仇视大清帝国的边

民，也仇视白人）。正是这些团伙占据着上东京地区，我们将之称作“黑旗军”。甚至安南的官吏，朝廷中或者河内的举子（更准确地讲是秀才）以及一些反叛者，他们全都躲到这些队伍中。他们的现在无法与将来的另一支队伍相比，即在 50 年后，贾普将军率领的那支一流的军队。正是因为有了殖民主义以及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才铸造出爱国主义。在 1885 至 1900 年之间，安南的民族感情尚未得到特别地发展。请想想，东京只不过仅为其一个省的安南帝国，自 15 世纪以来，便一直受中国皇帝封建君主权的辖制。这一切与高丽或满族部落一样。

农民的反抗，如太平军或捻军的起义，尽管他们既打击“满族”政权，也打击地主，但是他们的“政治”特点显然不止如此。他们坚信，在一段不可忽略的时间内，他们能激励起富庶省份起来造反。在中国北部，在 1853 年至 1868 年间，捻军的骑兵实施长途奔袭，攻击军事据点和城市。在中国南方，在 1850 年至 1864 年间，太平军创建了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并且定都南京。他们的组织结构类似于法国的“扎克雷”和德国的“农民”组织。他们做出的首批决策之一，便是制定土地法：“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太平军的热情得到增加，信念得到巩固，从而反映出宗教对该运动的影响。他们的首领洪秀全就被视为耶稣的兄弟，上帝的二儿子。他从广州新教的传教士那儿学成起步，高举圣经，那种既神秘又有效的的基本武器。当太平军自己沦为拦路大盗时，这场起义所能剩下的，便是彻底失败一途了。

20 年间，涉及到我们的重大暴动就是义和团的举事。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它都算最有名的。这场暴动，在那个时代的人心目中，仍旧有历历在目之感，令人产生出恐怖的幻觉。在“五十天”时间内，清朝首都的外国公使馆被拳民们搞得心惊肉跳。

一旦火焰熄灭，死者入葬，以及外交关系恢复正常后，大家

便长时间地寻找造成这类恐怖事件的原因。有人认为这种原因是因为拒绝改革，是因为对外国人的仇恨，是因为同日本人在马关签约时所受的侮辱，是因为慈禧老太后及身边人物的微妙的角色，是因为秘密社团暗中策划的动荡……

中日战争以《马关条约》（1895年4月17日）的签署而告结束，这场战争正式开战的时间为1894年8月1日。中国的谈判代表在直隶总督李鸿章的率领下，带着诚意前往。对他们来说，主要想在“两个亚洲大国之间，两个文字相同的邻国”之间，建立持久的和平，以求亚洲的黄种人免受“欧罗巴白种人的威胁”^①。日方谈判代表由伊藤博文率领，他们用提高要价做出回答；这种要价之高，即使西方列强可能都难以启齿。中国人苦涩不堪，竭力限制对方的要价。最终签定的条约是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岛及澎湖列岛给日本，相当数量的港口对日本船队开放，中国政府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万万两。此外，日本人占领了威海卫，扼渤海门户……

3年后，慈禧老太后由于担心维新派当政，将光绪皇帝囚禁在瀛台，重握朝政大权（1898年9月28日）。此次政变结束了人称的“北京百日”^②……“从即日起，政务在偏殿处理……”用“历史性”一词来结束其政令，也表明光绪皇帝被废黜，理由是害怕大批的政务被荒疏……6位改良家刚起床便被捕了。一周

亨利·科尔迪耶，《中国关系史》，第三卷，1902年巴黎版。

注

威海卫，历史地名，现为威海，与辽东半岛的大边相犄角，扼渤海门户。——译注

北京百日，是原著的字面意思，实指“百日维新”。——译注

六位改良家，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译注

后，“刑部尚书”与组成合议庭的其他大员们判定他们死刑。李鸿章，《马关条约》的谈判代表与改良派的领袖之一^①，洋务派的人物，也被流放到山东……去“研究防止黄河泛滥法”。这便是当时昙花美好的一现。整个六七月间的改良措施（百日维新）显然被废除了。那个时代最奇特的历险，就数康有为的经历了。他是广州的文人，他在向皇帝递交“要求深层次改良”的请愿书后，被皇帝委以重任。该请愿书得到“数千名举人”的签名。

在九月政变后，康有为避难到了香港。他在那里猛烈地抨击慈禧的宠臣：那些人利用她就像“利用猫爪一般来实现自己的计划”。他写下几行寓意深刻的话，其大意为“只有黄帝才是我们最伟大的祖先，我们这个民族作为炎黄子孙，应该团结一致。事实上，我们是聪明、光荣的民族。这是所有黄种人共有的特点。现在，吾皇是先祖嫡传子孙，不仅文武百官，而且所有的当权者都这么认为……但是，慈禧太后与荣禄（她的宠臣之一）并非我们的君主。他们不过是先皇的嫔妃与奴才。他们毒杀了被其置黜的年轻皇帝。他们不仅出卖了老祖宗留下的遗产，而且还将出卖我们所有人民。他们随时都准备同外国人签署那种协定……”

1900年，根据帝国海关的统计，中国当时有两万名外国人，1100多家商埠。人数最多的当数英国人，他们有5400名“居民”，427处住地。随后是德国人，1530人，122处住地，接着是

实际上，他在变法维新运动中采取观望态度（《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5卷205页）。——译注

请愿书，实指著名的“公车上书”。——译注

引自亨利·科尔迪耶的《1900年4月5日中国北方的消息》一书。——原注

法国人，1360人，74处住地……港口开放的数量超过了40个。如果说海关仍旧掌握在一位英国人手里（海关总税务司赫德），那么邮政就控制在一位法国人手里。长江，中国最大的河流，有着通航的特别条件……这就是说，炮舰在任何时候都能逆江而上。上海由于地处入海口，已经成为西方渗透的大本营。自从与日本签定条约后，德国人将胶州港占为己有。“伊特里号”炮舰的沉没揭开了整个事件，在这场可怕的风暴中再次形成空前的团结。随后，在1897年11月1日，两位传教士被杀。11月14日，凯泽·纪尧姆的队伍强行登陆。1898年3月6日，一纸协定承认了既成事实。同时，俄国人在冬天获得了旅顺港的使用权。他们后来于1905年被日本人赶了出去……在此期间，日本人将威海卫让给了英国人（1898年）。

就法国人而言，好似不太满足，他们通过1900年1月5日批准的条约，才获得广州湾的那么一小点让步。事实上，他们还有别的企图，此企图显然与东京地区有关……但是在当时的北京，是义和团说了算。

在中国，布告栏里好像始终在公布坏消息。这些将墙贴得花花绿绿的告示，于1900年3月20日早晨，晓喻外国人，称他们肯定会在“阴历五月一日”被“屠杀”……9天后，北京的每位良民都受到舆论的煽动，要求用石头砸洋人。北京火车站被洗劫、被焚烧。外国人成群的躲到大使馆、公使馆，而中国人用炮口威胁着这些地方。那些炮就架在本地区的制高点，雄伟的前门上。一些海军与士兵的炮弹已经落到了北京，但是英国人西摩尔

① 1897年11月1日，两名德国传教士因逞凶杀害两名中国人，在曹州巨野被愤怒群众所杀，史称“巨野教案”。事件发生后，德国借机派军舰占领了胶州湾。——译注

指挥的主力援军被迫向后转，甚至逃离了天津港。6月11日，一位日本的外交官被中国军队的士卒所杀。13日，义和团开始杀基督教徒与外国人的佣人。8支起义队伍占领了北京，那儿的教堂被焚，以及大使馆的避难楼房。当时重兵在握的端郡王为了让外国人离开北京，给他们24小时。

谁也没有动身。6月20日，邀外交官前往故宫。惟一接受邀请的德国人冯·克林德在途中被害于轿中。当天晚上，中国人开始炮击这个地区。29号，艰难地发动了猛烈地进攻。7月3日，语调变了……朝廷的一封电报“这些骚乱应归咎于那些匪帮，要求外国列强帮助予以惩治”。而那些最不幸的消息则在全世界传得沸沸扬扬。7月17日，炮击停止了，签署了停战协定。欧罗巴人方面有60人被杀，140人受伤。

联军的增援于7月14日拿下了天津。这支军队的指挥官为德国统帅冯·瓦德西伯爵。在他的账下，有法国将军华伦……1900年8月14日，联军进入了首都。

除了北京的附近地区外，中国其它地区并没受到义和团起义的影响。然而，在6月26日，一纸朝廷敕令要求各省官员帮助义和团驱除洋妖。在李鸿章之前，我们需要表彰有些官员的态度，他们是新任的两广总督，沿江各省的总督，如武昌的张之洞，南京的刘坤一都采取措施，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在遥远的云南，如果弗朗索瓦率领的21名欧罗巴人被包围的话，那包围他们的队伍肯定不属义和团组织，尽管许多杂志试图将他的勇气与北京外交官们的勇气混为一谈。弗朗索瓦领事所面对的，更为准确地说是排外的仇恨和地方官员的双重压力……以及印度支那总督保罗·杜美企图干涉的压力。这种媒体的荣誉，既让人惊讶又仅为昙花一现，这好似说应该把住时机，最终深入到那垂涎欲得的云南省。

在幅员辽阔、问题成山的中国，还有一特殊的问题：在 1900 年那年，云南的中国人还有好些具体问题需要与少数民族中的穆斯林一道解决。应该说此事一直拖了 4 百余年，甚至可以从 13 世纪的忽必烈汗时代算起。当年，忽必烈路过此地时，留下了布卡拉省的乌兹别克人。后者从来没真正地同邻近各民族和睦相处过，如缅甸人与印度人，藏族人和泰人。这些少数民族，不是被中国的皇帝派用到铜矿中，便是被租给有权有势的官僚。他们因为不堪严厉的经济环境，而刚刚起来造反。在云南，在穆斯林居住区，起义的烽火燃烧得最为猛烈。

征服东京邻近诸省

在巴黎，完全像在西贡或河内一样——在这儿，甚至也是出于周边地区的原因，安抚上东京地区的困难似乎可以得到解决，但是只有在肃清周围地区之后。不管怎么说，在西部，遇到了暹罗人、缅甸人、老挝人的问题。在北部，云南成为中国小股武装和“强盗”的庇护所。在东部，广东、广西以及海南岛，它们都被视为法国的影响地区之一。

中国在签署《马关条约》后，欠下了日本的战争赔款。法国帮助支付这笔赔款是有回报的。茹·费里在 10 年前因为 2 亿法郎的额外贷款而倒台，然而这次，法国资本并没有用来支付白银 2 亿两的战争赔款，一两折和 3.75 法郎。在马关“受辱”后仅两个月，法国凭着一纸协定，于 1895 年 6 月 20 日，用 7 亿 5 千万法郎从中国手中购得了许多珍贵的东西。首先是安全，随后是追求利息及其他梦寐以求的东西。

勐辛是一座喜气洋洋三不管的小镇，位于暹罗、缅甸和云南三地交界处。由于它位于从印度到中国的要冲之地，地理位置相当优越。英国人清楚地预见到可以修一条铁路从缅甸的曼德勒到

云南府^①。而法国人认为，从云南到入海口，这条路比经由东京要近……英国人在扩大了他对缅甸的保护后，法国人在这方面的计划也因此受阻。勐辛小镇应该重新回到法国人手中。虽然达成协议，但托管勐辛的老挝再也不属于法国。英国的一只队伍已经进驻了该地区……

法国人垂涎已久的云南便成为讨利息的地方。一些报刊杂志载文吹嘘这块土地之富有，当年好似仅有马可·波罗来过。最著名的报纸也刊载了不可否认的证词，其中就有领事埃米尔·罗谢，旅行家莫雷斯侯爵。前者在太平军起义期间贩卖军火，并在锡贸易上发了财……后者在整个西藏的旅程中，一直陪着奥尔良的亨利王子。在他的努力下，法国反犹太人联盟始终充满活力，他还在决斗中杀死了法国军队中许多犹太军官，他因此身负血债。

不管怎么说，《为了渗透中国》（1890年写于桑利斯）这本小册子（匿名）是莫雷斯写的。该书成为法国政治家们的必备书，因为他们想实现这一理想。书中这样写道：“就我们在远东的行动而言，东京的重要性尤为特别，别忘了这个国家的三个边境省份，云南、广东、广西正顺从地围着我们的引力圈在转动。在正常的情况下，法国如果能够在东京站稳脚跟……”莫雷斯侯爵要资金修建一条铁路，作为“联系印度支那与中国这两大板块的连接线”。

当时的外交部长加布里埃·阿诺托对此构思颇为满意，他论述了1895年6月签署的条约。其中第五条中准确表明：

“根据协议，有些铁路在安南已经建成，或者正在设计。然而，在达成共识后，在确定条件中，该铁路可以延伸到中国的土

地上。”

此外，如果要在云南、广东、广西开采新矿的话，据说会雇佣法国工程师……

但是，英国人一直占领着勐辛。有加布里埃·阿诺托加盟的里博内阁于 1895 年 11 月倒台。在随后建立的布儒瓦内阁中，马塞兰·贝特洛接手这些文件。他也想着“打开进入云南市场的通道”。这次法、英之间于 1896 年 1 月在伦敦签署了一纸条约。条约承认法国的影响“一直延伸到湄公河的深泓线”，勐辛公国立即因此获得解脱，英国的影响到右岸为止……

英国人采取了谨慎的作法。他们坚持要明确地表明：中国给他们两强中“这个或那个强国”的优惠应该扩大，并为“两强共有……”

1896 年 12 月，重大事件：保罗·杜美以总督的身份到达印度支那。39 岁的他带着显而易见的野心，他的政敌将之称为“个人权力的野心”。简单地讲，这或许是一位军官当时表达出的个人感情。这人稍微比他年长一点，并且即将离开东京。他便是未来的利奥泰元帅。他说：“我喜欢极权，这是我一生中惟一的嗜好，而我流了 20 年的血也没有得到它……其实即使我无法当法兰西的总理，我有朝一日也该成为印度支那的总理。然而现在只剩下嘴上说说而已了。我不会为追求在这土地上的宁静享受而彻夜工作，使大脑高度紧张，而放弃意识力量的超级感受。”保罗·杜美生于欧里亚克，父亲是铁路部门的一位队长，去世时他还年幼。他先在巴黎的雕刻家约塞夫·阿塔纳斯家中做家教，随后在外省当了一名数学教师。他是一位第三共和国中值得称道的人物。拉昂地区的阳台空间过于狭小，带给他的满足感哪能与奥塞尔平原相比？正是在奥塞尔，他第一次挟起“部长包”，成为莱

昂·布儒瓦内阁中举足轻重的财政部长。准确地讲，正是这届政府（1895年11月至1896年4月）在法、英之间解决了勐辛的问题，云南规划因此走上正轨。

对于印度支那的材料，保罗·杜美相当熟悉。他于1895年为安南和东京的地区做预算报告时，便第一次阐述过它。而在1896年，他又以部长的身份介绍了二月份做的预算。但是当时更加吸引国人注意力的，不是印度支那，而是他打算向法国人征收所得税。正是收税这件事在当时捅了马蜂窝。此事要得到某种程度的接受，还得等到1914年。

在印度支那，保罗·杜美以彻底独立预算为开端。他信奉的这种人生观，显然承袭自利奥泰那儿的人生观。后者在谈论小皇帝惠时说：“他的罪恶，他小弟的疥疮，他在内宫中的残暴，我能做什么呢？他是嘉隆、明命朝代的子孙，阮氏王朝的最后一人，而且这个王朝拥有2000万人口的社会大力量。当他路过时，臣民便伏在灰扑扑的过道旁，他小指头一动，就是绝对的命令。哦，上帝啊！既然我们牵着了这种力量的牛鼻子，我们就应利用这股力量，而不是去拂逆它。这其中含有保护国的整个哲理。”

拉内桑与鲁索也利用过当地的民族。但是保罗·杜美与这二位前任不同，他在“即将安抚下来的”土地上，首先理顺行政管理。为了在东京北部边境地区取得和平，他代苏将军支付了债务，从而在理论上收买了他。苏将军亦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表现，帮助法国人最终收拾了“土匪”。杜美统一了他的疆域，并在这些地方中招募了一些当地人，以充实他的便衣卫队，并招募了一些优秀人才进到省一级委员会中。5年间，在安南，他借征收所

米歇尔·布吕吉埃，《云南铁路》，1963年，巴黎，外交史杂志。

——原注